

论沈一贯及其《老子通》

——明代的《老子》研究之四

李 庆

和文要旨

沈一贯（1531～1615）は明代万曆期の宰相であり文人でもあった。その著作『老子通』は、後に日本に伝わり、明治初期の漢学者根本通明によって高く評価された。

彼については、多くの史料が残されているが、その評価はさまざまであり、相対立する意見も見える。彼ははたしてどのような人物であり、なぜこのような現象が生じたのだろうか。本論は、沈一贯の著書『老子通』を中心としてその思想を分析し、上述の問題を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

また、沈一贯という人物の内在的な矛盾を究明しながら、同時に彼の思想が明代万曆期の政治状況の中でどのように展開されたのか、このような人物を生みだした明代万曆期の政治状況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問題の検討を通して、中国思想の主流である儒教と道教の異同も追究する。

本論は筆者の一連の「明代の老子研究」の第四篇である。

在现存明代有关《老子》的70多种论著中，晚明时沈一贯（1531—1615）的《老子通》，别具特色^[1]。

说它特别，一从著者的身份看，为晚明时期的宰相，而且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二从著作的内容看，如果说明代其他的解《老》之作，主旨多在“解”上，也就是阐述《老子》的要旨上，那么，此书则更侧重于强调《老子》之“用”，即以《老子》作为治世处世的道具。

明初，开国不久的皇帝朱元璋便撰有《御注道德真经》，也是以《老子》为治

世之书^[2]。他们的著作，乃是明代《老子》研究中的一种流派，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思想构造的一个侧面。因此，在此想以沈一贯的《老子通》为中心，对沈一贯其人和思想作一些研究，并进而探索一下当时士大夫思想构造的情况。

(一)

说到沈一贯，虽说直接论述他的论文不多，但在有关明史的著作中，却说到他的倒也不能说没有。稍加涉猎，就可以发现，关于这个人，多有矛盾。

首先，是他前后时期志向的矛盾。

他曾写过这样的诗：“上以揽千古，俯将穷九流。身依双龙际，足蹶三山游。…言愿佐王略，漂纓匪徒谋。不然志删述，垂辉耀春秋。变彼弄柔翰，壮夫以为羞。”^[3]很有一点得意之气和欲佐王侯“垂辉耀春秋”的豪情。

但是到后来，同样是这位沈一贯，又有这样的诗：“欣生戚已谢，性定命不移。洗心付逝川，昼夜长流澌。斋前四从人，颇闲童约词。”^[4]说的是他在京中之邸，原是以前的宰相徐阶的住所，时过境迁，感叹不已。想的只是随波逐流，已完全没有豪然之气了。

其次，是自己所做和自己所说的矛盾。

如在楚宗案中，对郭正域，有人问他，“郭公将不免，人谓公实有意杀之。”他明白地否定这一点，“酹地若为誓者。”^[5]

但据载，他又命从党对郭多加追究。曰：“四明（沈一贯）与归德（沈鯉）相左，会妖书事起，乃嗾其党钱梦皋论之。”^[6]

再次，沈一贯自己的表白和史书对他的评价的矛盾。

《喙鸣文集》卷二十一《答亲知劝驾书》，对自己有这样的表白，曰：“吾之不能一日安也，有十以焉。多病一也；矜矜顾小节二也；不记事三也；不喜树党植交四也；心轻厌中人，不愿与共事五也；事制肘不可为，纵为，可小不可大，六也；好洁廉，无资以充结交七也；四面攻者多，八也；不能忍气，虽习宽大，终非性之，九也；坦夷平易，耻作儿妇人附耳语。淡泊清静，不喜作为。又以竞进为深愧，以保宠为大辱，十也。”自认是非常淡泊。

但是，《明史·沈一贯传》：“辅政十有三年，当国者四年。枝拄清议，好同恶异，与前后诸臣同。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

能解免也。”^[7]对沈一贯严加指责。

《明通鉴》“万历三十三年”引《三编御批》：“楚宗事暧昧难明。当时之号为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说，究也未有确凭。”“乃沈一贯独执‘宜访不宜勘’之言，委之于抚、按，仍归颠预了事，适足找疑谤之口。于是阁臣、礼臣，互相袒护，攻击纷纭，日以报复相寻，转置楚宗曲折于不问，朝局之坏，盖至是时而极矣。”^[8]这就更把当时朝政之坏的原因，归之于沈一贯。

此外，各种人对他评价的矛盾。

如，万历皇帝多次对他表示信任，称他：“朕素知卿忠诚亮易，何必具疏自明。方今国家多事，议论纷纭，正须卿用心，以定国是。”^[9]

而当时人刘元珍则认为：“一贯曲庇私人，为术甚巧，内则假公以摇上，外则挟威以制人。既借皇上之权以伸其意，后窃皇上之德以固其交。顿令百年钜典，忽焉决裂，而皇上独任其咎。”^[10]

可见这是一个颇为有争议和有复杂性的人物。那么，沈一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呢？

(二)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各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对他本人思想的内在性的探讨，一是对他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而沈一贯所著的《老子通》是很能反映他本人思想构造的作品。

在论说《老子通》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沈一贯的生平和有关文献的概况。

沈一贯，字肩吾，浙江鄞人。其父名仁佶，字允成。

沈一贯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1年）年^[11]，曾师事赵大洲、殷棠川^[12]。隆庆二年进士。曾因言而得罪权臣张居正。经历波折，做到吏部左侍郎。

万历十五年，他五十一岁。一度归省，脱离了中央政府。正是在这时，他写了《老子通》。此后，在万历二十二年，和陈于陞一起被推为大学士，为宰辅。他是带着张居正反对派的色彩进入内阁的。

万历二十六年以后，随着位于在他之前的王锡爵、张位、陈于陞等的离去或去世，成为实际主政的宰相。二十九年，赵志皋卒，他升为为首辅^[13]。但从这一年起，因沈鲤、朱赆的入阁，他和沈鲤的纠葛越来越深。

晚明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定国本、废矿税、楚宗、妖书案、播州之乱、建州女真的崛起、朝鲜和封倭等等，都发生在这其间。

万历三十三年，他因京察等事被言官非议，因而退避。三十四年，和沈鲤一起致仕。

致仕以后，他家居十年而卒。卒于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丙子（1615年）^[14]。

在他参与和主持政事之时，正是明代多事之秋，在其间，由张居正死去，整个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在此其间，朋党渐成，党争日盛。而这和沈一贯的作为，不能说没有关系。

沈一贯的主要著作有《易学》十二卷，《老子通》二卷，《喙鸣集》三十九卷，《敬事草》十九卷，编有《位州稿选》等^[15]。

沈一贯的《老子通》，现存有明代万历丁亥年间的序刻本。此书在中国国内明代以后，国内似未刊过。据《全国善本书目》著录，仅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少数图书馆有所收藏^[16]。

在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本，附有林罗山的句读，又有“浅草文库”殆是由林家的藏书，经浅草文库，而归入内阁文库者。此书在20世纪初的1909年，日本东洋大学曾和朱得之等的《老子通义》、毕沅的《老子考异》等一起，据内阁文库的誊写本排印刊行。此本在刊刻时，以沈一贯所著《读老子概辨》列于前。对于此书，日本明治初期的著名汉学家根本通明曾说：“明大学士沈一贯《老子通》，亦有发挥其大旨处，然藏之者稀，若逢之则倾囊沽之，亦在所不辞。”可见颇为其所重^[17]。

《喙鸣集》在中国的流布也不广，存于上海图书馆等处^[18]，日本则在尊经阁存一种明刻本。

（三）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老子通》的主要内容，探讨一下，它的特点和反映的思想观念。

根据沈一贯《老子通序》：“万历丁亥春，一贯请告归省。既获命矣，会上方静摄，未果辞。装已入舟，邸中虚无书。□山程孟孺手书五千言来寄。发而读之，有会于心也，辄命泰鸿从旁录^[19]。居数日满纸，遂借诸家笈，参互而削成焉。成

之日，次德州矣。”则此书成于万历丁亥。这是他多年现实生活经验和学问思考的结果。

和大多有关《老子》的解说著作相似，沈一贯《老子通》也是在每一章之后，对《老子》的原文进行解说。关于解说《老子》的基本态度，他在《老子通序》中这样说：

“儒者如苏、吴、薛、王，纳而附之儒不异，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论之，其首肯哉。今一贯独以老解老，而异同之际，使人自择焉。”也就是强调要“以老解老”。又认为：“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老子通序》）注重于对孔子和老子之说进行比较。

在他的注中，或引前人之说，加以辨析，或直接阐明自己的意见。如，他多引苏辙（子由）、吕惠卿（知常）、薛蕙（君采）、王道（文定）等人的看法，进行论说^[20]。而这些著作，在焦弘等人的解老著作中也多被引用^[21]，由此可以看到，在当时社会中，有关《老子》著作流行的情况。这也说明，他的《老子》的解释，是在上述诸人论述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对王道的观点，颇有同感。如对王道驳朱子语，认为“以王文定之说当”（见第11章），这当是由于他和王道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的缘故^[22]。但是，他的重点不在于字句的解说，而是对一些问题的论说。所以，在此也就重点来探讨他的一些有独特性的思想性的见解。

通观全书，我认为，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主要的看法^[23]。

一，关于“道”“有”等主要范畴的论说。

1，关于“道”。

在对“道的”论说中，沈一贯一方面主张老子和孔子根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又提出，“道”确有等级之分。认为：

“老子之言详于上而略于下。孔子之教详于下而略于上。孔子为中庸者言，故其言多而卑，其道广而大。老子为智者言，故其言节而抗，其道独而尊。”（38章）

认为所谓的“道”有等级，是对于不同对象而言的：

“夫道深矣远矣，与物反矣。惟上士能动而行之；中士疑信半焉；下士直大笑之耳。使道不为下士所笑，则道亦下矣。”（41章）

2，关于“有”“无”之争。用现在的话，或可解释为对世界的存在的认识，晶

管特也有着“有无一也”（70章）之类的讲法，而实际上，是主张“有”的。说：

“道之状云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惚似无也，居无非无。有无难定夷。然而其中固有象也。其中固有物也，非无也。”“物生而有象，象生而有名，名之曰道。实有一物之可指矣。”（21章）他的说明虽说绕了很大的圈子但在根本上是主张道本为“有”。

3，关于“有欲”“无欲”之争，他强调有欲。曰：“惟无欲能制欲，惟无私能成私。老子所谓私与欲者，凡今之禄位名寿富贵福泽，一切有为之事皆是。”（7章）他并不认为圣人无欲无私，而是以“无欲”“无私”的“大无私”的形式实现之。认为：“惟无私也，故能成其私。”（36章）

4，对于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从根本上看，人性为善。曰：“人虽有善有不善，而原其本心，未尝不善。”（49章）

这些看法，我们如果把它放到明代嘉靖以后，整个社会思想流变中去认识的话，就可以看到，和晚明时代流行的对僵化了的程朱理学的反拨的思潮是相一致的。而他作为一个主要的宰辅的思想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有一定的影响，也可想而知。

二，关于济世治国的论说。

在第74章中，沈一贯引用了明代“高皇帝”朱元璋语：“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至宝”强调《老子》治天下的作用。《老子》内容中包含着“形而下”，治世之“用”的一面。在《老子解》中，沈一贯也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济世治国”的方法和理念。如果说在对道、体，人性等“形而上”问题上，他提出了上述一些新的见解，其要在于融通老子和孔子之说的话，他在《老子》之用上，或许可以说，更多地带有传统的道家和法术家的色彩。

就济世治国的主要方略而言，他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

1，治国的基本方向，在于贵自然。

他说：“老子‘载营魂’之要，在于抱一，抱一在无为自然而已。”（10章）这可以说是最他关于济世治国的基本看法。

具体而言，他认为：“自然者，感应之常，理势之所出至也。”（23章）就是不必人为地过于求变革，任其自然以治天下。

认为，圣人无为：“是以圣人惟无为，故能役使众强，出入群有。”（43章）“无

为无事，坐而化之，而天下自治”。(57章) 圣人只不过顺机而动，无敢多事：

“因其势而导之，易简而理得。违其性而扰之，烦劳而罔功。圣人顺其机而不敢逆。循其变而所堙，特就中去其过当者而已。而无敢多事。所谓以人治人，改而止也。所谓不为己甚也。必求如我之意而后已，则纷更多事之忧生，而势亦不能尽如吾意。”(29章)

他批判当时的人：“近人贪有为而失自然。”(20章) 过于生事求功。

然而在他的思想中，“无为”，又不等于“遗弃万事”，一无所为，而是要以“无为”达到有为的目的。关于这两者的关系，他这样反复强调：

“世之言治者，多眩露其聪明，驰骋于事功，而不知无为之为妙也。及知矣，则又不免于遗弃万事。斯二者皆惑也。”(10章)

“夫无为者，非贵无为也。”(38章)

“圣人非无为而为无为，非无事而事无事，非无味而味无味，”(63章)

“民非治之所能治，而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58章)

也就是说，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达到“深治”。但是，他所追求的“深治”和前面引用的作为总原则的“自然”的状态有怎样的关系，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呢？这是很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治国的具体方法，主张“阴柔”，濡弱谦下。甚至认为，只要心正，未尝不可用权谋。

他说，《老子》“其大旨与孔子不异，特其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与圣门殊矣。”(1章)也就是在具体方法上，要“濡弱谦下”。这种“濡弱谦下”，在一定的情况下，就表现为主张不露声色，以求一击中肯綮。

曰：“圣人以之兼畜人，一物有伤皆引以为憾。又何任喜怒作好恶而轻以声色加人哉。”(61章)

认为“非其时，则一事不加诸身，一言不以出诸口。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若庖丁解牛视止行迟，桀然而已。”(45章)

沈一贯在所著《读老概辨》中，曾对“程子”“老子杂权诈，秦愚黔首其术盖有所自”之说，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说：“老子之意，果然邪”(2页)，而到了《老子解》中，则有了一些变化，认为《老子》中确实讲权谋之术处，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智自私之心”而已。认为：“老子之言，不为阴谋用乎？曰，顾其人

何如耳。”“然老子虽用权，实未尝有用智自私之心，此武王太公所不废者也。”（36章）也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权谋的肯定。

3，在表现的形式上，主张以简为贵。

他说：“圣人之言，最易最简。易知易行，而天下莫知莫行也。”（70章）反对过于繁复。

三，关于处世方法的论说。

在《老子解》中，沈一贯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说作为个人的现实处世理念和方法。

1，名利观。

就个人处世的基本追求，他认为：身与名都是重要的。然而“负道寄德，配天地泽万物者，身也。贵爱其身，岂可在命利之下哉。危身而取区区之名求沾沾之利，惑矣。”“细身大名，未可与论至道也，轻身重国，未可与图利也。”（44章）

对于“名利”的追求，他认为，如要名，则不以“小名”而失其大名。曰：“故甚爱名者失其大名，甚爱利者失其大利，甚爱生者失其大生。”（44章）

2，而要达到上述的目的，他谈了如下一些具体的方法：

方法一：当以退忍以求成功。认为“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

强调不为天下先。他说“其用则以濡弱谦下为贤也。慈也俭也不敢为天下先。是也，足以观老子之宗矣。”（70章）

方法二：当以“无争”，以不树敌，以求生存。曰：“大道摧挫芒锐而无圭角，解释纷结而无系累。”（4章）对第8章的评解：“此章贵不争。”（8章）都是强调这一点。

方法三：“混世同俗，并处杂居而不自表洁。”（4章）也就是要能够容纳社会和其他人污俗和不洁的一面，而不是过份地洁身自好，以免“曲高和寡”。

3，就自己的心理状况而言，他反复强调要“知止足”。

他说：“不自知止足，则何时为成，何时为遂邪？”（9章）

也就是把“足”放到一定的范围中去认识，认为那是和“不成”“不遂”相对而成立的。

4，对于外来的评论，要宠辱无惊。他说：“人知宠之为宠，而不知宠之为辱，有若净然也。”（13章）“可惊莫如辱，而宠亦辱也。”（13章）认识到宠和辱都是相

对的，当宠辱无惊。

要之在沈一贯的《老子解》中，有相当多的部分，不是对《老子》哲理的研究探讨，而是强调如何在变幻的世界中，保住自己的利益。是调节自身利害的方法。在这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的心理构造。

在此，不妨把《老子通》所主张的内容和正统的儒家济世方法、理想的君子观念，稍进行一下对比。

关于身与道的关系：

孔子：“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24]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

关于社会 and 个人的关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关于处世和为人的表现形态：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公孙丑上》）

关于权谋机变：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尽心上》）

也就是说，儒家强调道、仁、义等理念，主张“杀身以成仁”。尽管说《中庸》等著作中，也有强调“中”“和”等的观念，儒家学说，也未必都那么僵直，有着柔和性的一面，和《老子》所说的“道”等相通的，但上述那种强烈勇武的倾向，在《老子》中则是完全没有的。而沈一贯的《老子通》中所强调的，恰恰是和这种倾向相反的，圆滑的、阴柔的一面。所以，在他的观念中，存在着和正统的理想型的儒家观念的矛盾，也就是很显然了。特别是这种倾向如果和明代以《四书大全》为代表的、被僵化了的程朱理学的观念相对照，矛盾就特别明显。

如果说“儒家”讲求的是如何面对外在的世界，并加以整治，那么，沈一贯的《老子通》里则强调的是，在整治天下的过程中，首先如何保住自己；内在的

心理和方法。他说老子“厚”，或许就“厚”于此，厚于自身。他的关注重点，始终是在于自身。

也就是说，在此书中，虽然沈一贯力图把他所说的《老子》的济世处世的原则、方法和正统的儒家的主张相沟通，但在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倾向上的差别和内在的矛盾性。

这种观念上的矛盾，现实地汇集于沈一贯这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在一定的外在社会环境之下，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四)

那么，沈一贯处在一种怎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呢？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沈一贯在《老子通》中所阐述的那些观念，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又表现为怎样的形态呢？

沈一贯所处的万历时代，是明王朝的转折点。万历时期，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万历十二年以前，这是万历的初期，由于张居正的独掌权柄，表现为张居正和反张势力的对立；张居正死去以后，围绕冯保掌权的政争，再加上进一步对张居正势力的清算，到万历十一年，权力转移可以说基本完成，万历皇帝自身成了真正的权力中心。

第二，万历十二年以后，到万历三十四年。这是各种矛盾涌现，朋党逐步形成的时期。万历十二年以后，随着强权宰相的消失，中央政府权力空间的出现，这时期的各种朋党开始形成。万历二十二年进入内阁的沈一贯，在这一时期是主要的当权者。

第三，万历三十五年以后，矛盾激化，是整个明王朝日趋瓦解的时期。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入主内阁，朋党越演越烈，内政外交，日益见困。最后导致明王朝的最后崩溃^[25]。

在上述的第二阶段，即万历十二年以后到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中，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有：

1，皇权内部的矛盾。

以“定国本”为中心，万历皇帝、郑贵妃和慈圣皇太后、东宫太子等，在宫

内多有不协调之音。其实质，是根据“祖宗之法”，要立长子为储的慈圣皇太后、朝廷大臣和想按自己的感情决定后继者的万历皇帝、郑贵妃的矛盾。

“立储”“定国本”之议，至少在万历十四年时，就成为了话题。十八年时，首相申时行又曾提起^[26]。此事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在沈一贯的坚持下，才得以有了结果^[27]。

2, 皇权和行政、官僚的矛盾。

具体表现在矿税问题上。矿税，实际是皇帝越过正常的行政过程，直接征收的税。矿税并非始于万历，但在万历年间尤盛。

万历十二年以后，万历皇帝掌握了政权，欲行“新政”但实际的收入，无法应付当时日益增多的行政支出和他过度的奢望。如在这些年日益增多的边饷（平西夏、防建州、平播州之乱、援朝鲜等），内政（治河、赈灾）、他自己还有宫内三大殿等的修建，所以财政实是非常困乏^[28]。因而他的收矿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29]。

实际的负担多落到了百姓身上。而且派出的征税太监等，横行霸道，大肆中饱私囊，因而和行政的矛盾加剧，民怨鼎沸。废除矿税，成了当是官僚和皇帝争执的焦点之一。

3, 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

这包括政府内辅臣之间、行政和言官之间，以及在朝和在野的士大夫之间的各种交错的矛盾。在这其间，结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倾轧。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去以后到三十四年沈一贯和沈鲤同时“致仕”，申时行（长洲人）、许国（歙县）、王锡爵（太仓）、王家屏（山西大同山阴人）、赵志皋（兰溪）、张位（江西新建）、陈于陛（四川南充）、沈一贯（浙江鄞县）、沈鲤（归德）、朱赆（浙江山阴）等先后入内阁^[30]。

从其中的出身地来看，江苏浙江占的比例最大。各地出身的官僚，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派系。故当时有这样的说法：

“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牒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疑者摘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混诋林泉讲学之人，则人心不服。护者因人摘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概訾论者伪学之禁，则人心亦不服。疑者不服，不

免牵淮抚以箝之，以淮抚李三才素窃林泉之誉，以自固也。护者不服，则亦率苏浙诸脉以箝之，以林泉者素弹苏浙之奸而被斥者也。意有主奴，遂有左右，而党议于是乎渐起。”^[31]

而其中，万历三十年后，钱一贯和沈鲤尖锐对立，尤为明显。（见《沈鲤传》）史载，沈一贯担心沈鲤入阁后，要夺他的权。《明通鉴》卷七十二：“沈一贯以上心夙向鲤，贻书李三才曰：‘归德公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32]——此说当是由李三才揭出的。可见李三才原来和沈关系不错——否则，如此之言不会和他说。而后来李三才揭出此事，说明了二人的关系恶化。但对此说，笔者颇存疑。以沈一贯的为人处世态度，会不会有此信给李三才，实可再考^[33]。

言官和行政的矛盾。明代的言官，本来就敢言。自张居正等权臣消失后，对内阁辅臣等就更多弹劾。其动机虽有不同，但就整体而言，正如当时的首辅赵志皋所说：“昔日之阁臣，势众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之阁臣，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34]（《明通鉴》2789页）

在野的知识分子也和当政有矛盾。如钱一贯和顾宪成——在入阁时就有不谐和的因素。万历二十二年，当是廷推阁臣，钱一贯和顾宪成都预其名，但一入阁，一受贬^[35]。二人之间自生芥葛。

4，明朝和四周边疆、有关国家的矛盾，一就是所谓的边患。

在万历十二年到三十四年间，主要的边患有：

东北建州女真势力渐渐成形。其间先是由李成梁主持，尚能维持，十九年罢李成梁，事就渐不可收拾。到二十七年高淮又被派往辽东收矿税，更加剧了矛盾。（《明史高淮传》）^[36]

西夏之乱。万历十九年，因调兵往甘肃以及兵饷等问题，引发了宁夏的唃拜之乱。先后由魏学曾、叶梦熊、梅国桢等的征讨，经一年多，到万历二十年，平定了反乱^[37]。

援朝抗倭。即和东边的朝鲜、日本的关系。当时的“倭寇”，在嘉靖年间就成为了明朝的一大问题。万历二十年，丰成秀吉从釜山登陆朝鲜半岛，攻占王京（汉城）。朝鲜王请明朝救援。宋应昌、李如松、邢王介、杨镐等，先后经略，前后相持了七年之久，最后因丰成秀吉死去，战事方告一段落^[38]。

平播州杨应龙之乱（万历二十七年）朝鲜日本之事方兴，南方的播州之事又起。

播州杨氏，世袭为土司。万历时的宣慰使杨应龙，因目睹四川官兵腐败不经战，有独踞全蜀的野心。万历十八年时，就和明中央政府有所纠葛。万历二十年，公开盘踞播州，不服中央。万历二十七年，朝鲜事告一段落，次年，神宗即全力征播州。经一百多天的战事，平定了播州之乱^[39]。

此外，河套一带、四川和西藏等地的问题，也都不时发生。

这些边患的平定，使明王朝大丧元气，经济益发困乏。

5. 统治者和民间的矛盾。

矿税等税收的负担，最终是落到百姓身上，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同时，在万历其间，自然灾害也连续不断。据《国榷》《明通鉴》等史书记载，万历二十年后，沈一贯实际当政时，大的灾害有：

万历二十四年秋，黄河在单县决口。万历二十五年，黄河又决，

万历二十九年，黄河开封决口。万历三十年，福建等地告灾。河州黄河突涨。万历三十一年，泰安大水。苏家庄决口。故史载：“时，徐、泗、淮、扬间，无岁不苦水患。”（《明通鉴》）

繁重的赋税，连年的灾害，使百姓无法生活，引发各地的民变。据记载：

万历二十八年“两畿、各省灾伤，又苦矿税，兵民多起为盗。”

万历二十八、二十九年，武昌民变。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万历三十年云南、广东民变。万历三十一年，河工之变。

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反乱连续不断。

当时的吕坤曾上疏，言天下安危：“今天下苍生贫困矣。臣久为外吏，见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今国家财用耗竭夷。”^[40]

在这样的多重矛盾之中，由于沈一贯置身内阁，并在相当时期实际当权，因而处于各种矛盾交集的地位。他所持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学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不同，在不同的问题上，就表现出不同的色彩。

同样是沈一贯，在立国本、废矿税以及楚宗案、妖书案等的问题上，所表现的形态，和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不同，甚至是矛盾的。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1. 以国事为先，舍身以成之。

在“立国本”上，就表现了沈一贯的这一方面。

万历帝的“立国本”问题，从万历十八年申时行向万历正式提出，也已十多

年，结果由于沈一贯等的努力，在万历二十九年有了一个结果。当时万历下了诏书，但又要反悔，身为首辅的沈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这是颇有点舍身以成仁的气概了。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我想，一方面和他的思想中有着经国“济世”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当时行政、言官社会舆论等各方的意见基本一致，而内阁大致同没有党争，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有条件^[41]。

2，明哲保身，顺从上旨。

在废矿税问题上，他就是如此。要废矿税，沈一贯、沈鲤、郭正域、李三才还有大多数的官员、士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皇帝在众议之下，一度同意废除，诏谕已发，寻而又反悔。由于沈一贯不能坚持，交回前谕。致使矿税一直沿续到万历末^[42]。之所以会如此，殆他的处世观念起了作用。

3，从个人好恶出发，加以选择。

如京察，这是明代的惯例，每三年一行。要行京察，这并没有问题。但在所用之人上，因为涉及个人的好恶，就产生对立。

如三十三年京察，沈一贯要使用肖大亨，沈鲤则要用杨时乔。

实际上，肖大亨未必就是沈一贯的同党^[43]，杨时乔也未必是沈鲤的同党，但他的处世为人态度，和沈鲤多相似^[44]。他最恶“王守仁之学”。而沈则是著名阳明学者赵大洲的弟子，这中间沈一贯的个人的好恶，在用人时，就起了作用。

4，从党派利益出发，互相箝制。

如楚宗案。沈鲤、郭正域主“堪”，也就是要立案审查；沈一贯主“访”。从此案开始来说，和党派之争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如说是突发的事情。

沈一贯所持的看法基本是，此事事隔多年，弄不清楚（当时，并没有如现在可采用的遗传因子分析的科学手段。）立案审查，会株连太多，故“息事宁人”。——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实际是维护现实的藩王的利益。沈鲤、郭正域，特别是郭正域，则主彻底审查，这或许有其自身的背景，而从他们的观念上说，则是要以“理念”为先，要分清泾渭是非。

于是，观念上的差别，在现实的展开中，就成为派系的角斗。成为无所谓原则，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攻击对方。

此事又进一步连锁反应在三十一年《忧危弘议》的妖书之案上。妖书《忧危弘议》一案，其起因，当然是社会上风传的宫内矛盾，于是有人想以此之机，谋求利益^[45]。

而发展到后来，和沈令誉相善的胡化诬告阮，意在攻钱梦皋。其背后，也确实有郭正域的影子。因为沈令誉为郭的门客。

钱梦皋则反击，以楚宗事牵连郭正域，温纯，这里就包括攻击对方的部分。虽说是否是沈一贯示意钱梦皋等所为，虽现无确切史料可证，但沈一贯倾向钱梦皋，当无问题。

从开始的一般的看法不同，一旦卷入到派系纠葛的漩涡，就难以理喻。而这样的纠纷又成为下一波更大的矛盾的起点。明王朝也就在这样的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崩溃。所以，在沈一贯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现象，有时并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有着其实际的现实背景。是当时社会深层矛盾的反映。

这些矛盾，如果从其思想深层的观念形态看，有这样一些方面：

1，道德理念。也就是如何对待个人利害的问题。

一是按自己所遵循的“理”而行，从主观上是以天下为先。沈一贯在“立国本”一事上，也有类似的表现。

一是多考虑个人的得失。在“废矿税”上，如果不是沈一贯，而换了沈鯉等，在万历三十年时，或许就会顶住而使矿税废除。——虽说，即使如此，也还是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但在这关键时刻，由于个人的处世理念和气质的不同，就具体事件而言，也许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沈一贯的这种处世哲学，正如他在前面《老子通》中所说，“负道寄德，配天地泽万物者，身也。贵爱其身，岂可在命利之下哉。危身而取区区之名求沽沽之利，惑矣。”（44章）他是不“惑”的，先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因而，在关键时刻，就退缩了。

2，处世态度和个人的气质。

一是比较直切，不太妥协。如，郭正域，以勇于任事而获清名，为当时“清流领袖”。但是，在他的身上，也有着缺乏妥协委婉的倾向。如，他不认沈一贯为师——从本可以相安无事到为仇敌；对焦弘进《养正图说》，也要攻击。如果说沈一贯或还有一点权谋的味道，焦弱候为人，则更带有名士气的洒脱，并非专斤斤

于功利者^[46]。连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气度就略显狭隘了。

又如沈鲤“性狷洁，忤同官沈一贯。见内臣未尝与交言投刺”，不和内臣交往。但是，内臣、中官也未必都是奸佞之徒，如前面提到的“田义”，就有一些正义的侠骨^[47]。这些人，有着一种过于僵直的气质。抱着一种“唯我独善”的观念。虽有其正确的地方，但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有时就弄得没有徊旋的余地。

和他们形成对照的是沈一贯，相对柔和，主张不为天下先，阴柔相处。对周围的人物，乡党，多加联络沟通。《喙鸣文集》中酬答之作，多反映出这种色彩。他说自己“不喜树党”，他说：“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认为《老子》之道，“其用则以濡弱谦下为贤也。慈也俭也不敢为天下先。”（70章）这和那种强项作为的风格，形成对照。

3. 政治运作手法。

一是讲求以舆论、清议，造成声势，风行社会。

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和王锡爵曾有这样对话：王锡爵曰，近来都中有一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则答曰：“又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48]也就是说，顾宪成是很清楚的用“外人”的舆论来和“庙堂”的当政者抗衡。

而沈一贯，则采取的是隐蔽，协调，遵循成规，上行下效，顺其自然。在受到言官弹劾时多次上疏请辞。（见《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二年以后）他的政治运作手法，按其自身的说法是：“大直若屈”，“至人”不露声色。“藏器于身，待时而动。”（45章）他又常说：“吾逆知其无补，曷若从容以俟图之将来也。”^[49]对诸多事，不求进取，只以维持为主。

大致如此。

所以或可以说，上述的不同的倾向，一是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一是表现出大多数那个时代官僚的现实处世方法；一是着眼于当时明王朝更长远的利益，以求“长治久安”，一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现实利益，但求眼前安稳而已。

沈一贯的言行方法等，虽说时而也有“臣万死不敢从命”的抗拒之行，但整体而言，则是如上我们在分析他的《老子通》是所指出的那样，表现出一种阴柔的，任其自然的、利己的倾向。

沈一贯的思想和做法，在某些地方和当时作为正统观念的儒家的思想有出入，

而他自己却认为合于自朱元璋以来的“治国之法”。再加上明代官僚体制本身内在的矛盾性，一旦强权的调节中心丧失以后，各种政治势力了本身利益的本能性的律动，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这种派系而兴风作浪，所以，这种矛盾性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种矛盾性，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当时社会本身内在的矛盾的反映。并非只是沈一贯个人的现象，他只不过是当时官僚社会的一个代表而已。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沈一贯在《老子通》中所论说的主张，就可以对他的所作所为，对他的思想构造的社会意义，当可有进一步的理解。

(五)

然而，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

之所以在沈一贯身上表现出前面所说的矛盾性，除了他自身内在的矛盾性，他所处的社会本身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在历史过程中的对他的思想行动的解释和评价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有关他的评价：

在沈一贯死时，明朝的“礼部”对于他的评价是：“定国本于拜相之初，秉国成于行政之久，虽物议颇学沸腾，而天下想往风采。”而万历皇帝也认为他“久居首辅，功懋赞襄。”^[50]

这是当时正统的评价。

而谈迁的《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丙子”载有沈一贯的小传，有曰：“始善属文，负时名。及在相，好顺旨取容，于妖书楚狱，尤不惬人意。”这是当时民间的看法，就有一些变化了。

而到清代修的《明史》中，则有着明显的褒贬。

《明史·沈一贯传》：“辅政十有三年，当国者四年。枝拄清议，好同恶异，与前后诸臣同。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51]

再到乾隆时的《纲鉴易知录》中，贬叱就更严厉：“沈一贯既入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52]

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评价的变化。

如果从深层的思想观念来看，清代的修史者，更多地强调或褒奖那些“清流”有骨鲠之气、或者说更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倾向、因而对沈一贯多有贬斥。是非常明湿的。这反映了不同编著者的观点和好恶、也反映了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主流的社会理念的流变。

这样的价值判断是否正呢？如果冷静地把钱一贯和他同时代的人物，如郭正域、沈鲤、顾宪成以及他的那些“清流”的反派的思想 and 行动加以具体分析，二者之间是否有清代史书上描绘的那么大的差异，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而从思想的流变来看，则是从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间，正统的程朱理学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增强。上述《明史》等的论说，实际反映了清朝统治思想的观点。

历史事实，和历史书的记载——对历史的阐述、解释，有时、或者说经常是不一样的。不同时期对历史的评价和描绘不一样，这是由于会打上当时社会观众的折光之故。

要之，在沈一贯身上的不同色彩，带着历代编史者的好恶。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他性格上的矛盾性被渐渐掩盖，而按各个历史时期编史者的观念，被抹上了不同的色调。因而，我们现在看来，就出现了非常矛盾的评价。

通过对沈一贯和他的《老子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是中国当时官僚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在理想上，他们认同儒家的学说，也主张“性善”，在一定的环境下，也有着“济世”之志。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在运转着的政权机器中，他们是非常容易协调的部件。但这都不过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明确和追求自己实际利益的人物。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到了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冲突时，他们就会采取阴谋权术，“明哲保身”。

虽然说中国历史著作中，对这样的人物并不多赞赏，而是讴歌那些有“浩然之气”、有突兀言行的英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应该对这种判断加以再思考、再判断呢？那些被历代统治者褒赏的“英雄”和庸俗的官僚，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究竟有多少差别，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我想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表面的张扬、“浩气”，和内在的“无为”“保身”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知识

分子人格的两重、或多重性。这种思想观念的两面性，正是中国历代统治思想的两个侧面。沈一贯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人对他的不同评价，正反映了这种两重或多人格的不同表现。中国明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多重人格形成的温床和得以表现的现实舞台。

从《老子通》和沈一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人思想构造的一种典型形态。

参考文献:

- 沈一贯:《老子通》(日本东洋大学排印本,1909年)
 沈一贯:《喙鸣文集》(明万历刻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影印尊经阁文库藏本)
 《明实录》(台湾影印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本)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文秉《定陵注略》(《笔记小说大观》所收影印本)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五编所收本)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京,东京创文社,1998年)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范树志:《万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注释:

- [1] 明代有关《老子》的研究著作目录,见拙作《明代的〈老子〉研究之一》(载本《论丛》创刊号,1996年)
 [2]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
 [3] 沈一贯:《喙鸣诗集》卷四《初入翰林自述》。
 [4] 同上,卷五《抚庭槐忆徐文贞》。
 [5] 《明史》卷二百十六《唐文献传》。
 [6] 伍袁萃《林居漫录》卷一。
 [7] 《明通鉴》“万历三十四年”同。
 [8] 《明通鉴》“万历三十三年”。
 [9]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七,“三十年十月壬子”。7094页中。
 [10] 《明神宗实录》卷四零九,7632页。

- [11] 沈一贯《老子通序》：“今一贯五十加一矣。”，是时为万历丁亥。以此推得。
- [12] 《喙鸣文集》卷十五，有代“赵[大洲]师”“殷[棠川]师”所撰《墓志铭》等。可知沈一贯曾对他们执弟子礼。
- [13] 王锡爵去位于二十二年，见《明史》卷二百十七《陈于陞传》；陈于陞死于二十四年，见《明史》卷二百十七《本传》，张位去位于二十六年，见《明史》卷二百十九《本传》，又《明通鉴》“二十六年”六月条。
- [14] 见《明史》卷二百十八《本传》，又见《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丙子”。
- [15] 按《千顷堂书目》作《文集》二十一卷，《明史志》同。而实际《文集》二十一卷外，还有《诗集》十八卷。
- [16] 《全国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子部道家类。
- [17] 《读老子概辨》又见载于沈一贯所著《喙鸣集》卷十二。根本通明语，见见所撰《读老》，载浅井正纯《老子哲学的长短》（笔者所藏本）215页以下。
- [18] 同[16]。集部别集，“《喙鸣集》”条下。
- [19] 泰鸿，庆按：一贯之子。
- [20] 在《老子解》中，引苏子由注，见第11章、第26章、第43章；吕知常注，见第2章、第6章、第36章、第68章；薛蕙（君采）注，见第25章、第26章、第77章；王道（文定）注见第2章、第8章、第11章、第29章、第36章、第79章、第81章等，最为频繁。此外还有司马温公（光）第42章等。由此可以看到，他的《老子》的解释，是在上述诸人论述的基础上展开的。
- [21] 参见拙作《论焦弘的〈老子翼〉—明代的〈老子〉研究之三》，载本《论丛》第四辑。
- [22] 沈一贯和王道，在一定程度上都和阳明学有关。容再论说。
- [23] 下引沈一贯《老子解》语，皆出排印本《老子通》，只列章数。
- [24] 孔子、孟子语，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3年）中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各篇。
- [25] 参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范树志《万历传》等诸书。
- [26] 万历十四年时，就成为了话题。见《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明神宗实录》“十四年四月”。十八年时，首相申时行提起，见《明史·申时行传》《国榷》。
- [27] 见《明史·沈一贯传》。
- [28] 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九，“万历三十二年八月甲辰”沈一贯等的上疏。
- [29] 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三零，“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戊戌”“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殿，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又《明史·沈一贯传》，万历帝说“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
- [30] 关于各宰辅的书籍贯，参见《明史》各人本传，不具体征引。
- [31] 《万历邸钞》二十二年庚子卷所收张延登《疏》。
- [32] 《明通鉴》2825页。

- [33] 关于沈一贯的处世态度，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 [34] 《明通鉴》2789页。
- [35]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陈有年传》。
- [36] 《明史·李成梁传》，又，《国榷》卷七十二“神宗万历十二年”，《明史高淮传》。
- [37] 事见《明神宗实录》《国榷》《明史·梅国桢传》。
- [38] 《明史·日本传》，郑国梁《明日关系史研究》。
- [39] 播州杨应龙之乱，见《明通鉴》。
- [40] 连年的灾害，及民变的记载，俱见《明通鉴》各年条下。吕坤上疏，见《明史·吕坤传》，又《吕新吾文集》卷一《忧危疏》。
- [41] 见《明史》的《沈一贯传》《郭正域传》《沈鲤传》。内阁大致没有党争，见《明史·陈于陞传》。
- [42] 见《明神宗实录》《国榷》卷七十九“神宗万历三十年”，《明史沈一贯传》《明通鉴》。
- [43] 见《国榷》“万历三十年”，在矿税一事的处理方法上，肖未必对沈没有批判。
- [44] 见《杨时乔传》：他为人“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又“最不喜王守仁之学”。
- [45] 见《万历野获编》卷三“”条，又《明史郭正域传》。
- [46] 参见拙作《论焦弘的〈老子翼〉—明代的〈老子〉研究之三》。（载本《论丛》第4号，2000年）
- [47] 《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三年”。田义事，见《沈一贯传》。
- [48] 文秉《定陵注略》卷二“大臣党比”。
- [49]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一，“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丙子”庞时雍上疏引沈一贯语。7677页。
- [50]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八“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丙子”（9939页），
- [51] 《明通鉴》“万历三十四年”同。
- [52] 《纲鉴易知录》卷十，2844页。